

臺灣「當代目錄學」發展之探討 —從傳統走向現代—

鄭 恒 雄

摘 要

中國的目錄學發展源遠流長，累積了豐富的成果。目錄學有其時代性，臺灣當代目錄之學有傳承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精華者，亦深受西方目錄學的影響。尤其，大量引進國際及歐美圖書資訊與編目的方法，用以處理華文文獻。可以說，西方的目錄思想與方法已在國內生根，成為中國文獻目錄學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當代舉凡分類法、編目法、主題法以及資料庫的建置等都有蓬勃的發展，而與我國古典目錄有著顯著的不同。本文首述傳統目錄學的承繼，包括：分類法的變革、仿杜威法的採行、目錄學理論的探究與專科目錄的編纂、編目法之承繼與取法西洋；次述書目控制的理念與實踐，包括：書目控制的源起與意義、書目控制的探討與實踐；其後探討書目資訊規範化的發展，包括：書目規範與標準的研訂、機讀目錄之興盛等；再次探討網路環境下的書目控制，包括：元資料 (Metadata) 的興起、FRBR與RDA的發展趨勢、文獻計量學的研究；結論中歸納出：當代目錄學研究與實踐的成果、圖書館人扮演目錄工作的積極角色、當代目錄與目錄學新發展的探討等。

關鍵詞 (Keywords) : 當代目錄學 ; 書目控制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 Bibliographic Control

鄭恒雄：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E-mail: chenghh@blue.lins.fju.edu.tw

一、前言

中國古代目錄工作起自漢代，歷經幾千年來的發展，編纂的各種目錄不可勝數，因此積累了豐富的編纂經驗與成果，宋代以降遂逐漸形成目錄之學。歷代各種史志及官私目錄各具特色，其間顯見許多的編纂方法與目錄學理論，遞相沿襲，發揚光大，以迄於今。歷代各種各類的目錄，應有其時代的背景、需求與功能。後人編纂目錄往往取法前人之經驗與成果，而有所創新。

明清之際，海運大通，中西交流頻繁。西洋目錄的知識亦隨之而來，漸亦融入而為國人取法。加以今日電腦科技的進步，各種新的目錄制度與方法應運而生，大幅的提升目錄的功能。因此，我國當代目錄之學遂有傳承古典目錄學的精華者，亦深受西方目錄學的影響。尤其，大量引進國際及歐美圖書資訊與編目的理論與方法，用以處理華文文獻。可以說，西方的目錄思想與方法已在國內生根，成為中國文獻目錄學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當代舉凡分類法、編目法、主題法以及資料庫的建置等都有蓬勃的發展，而與我國古典目錄有著顯著的不同。梁啟超先生已有反對「愛古薄今」^[1]的目錄學思想，認為當代的目錄有其實用之價值。

當代目錄學的發展與圖書館的目錄工作緊密相關。筆者認為當代的許多目錄學方法，諸多來自西方，包括：前述的分類法、編目法、主題法及資料庫的建置等，具體內容包括：「書目控制」、「國家書目」、「聯合目錄」、「合作編目」、「書目資料庫建檔」、「書目資源共享」、「主題分析」、「權威控制」、「規範標準」等議題。其原理與方法也有許多與中國古典目錄學相沿相通之處，只是隨著時代的潮流賦予新的面貌與結合新的技術與方法。舉例而言：

- (一)當代有「十進法」、「國會法」等分類法；古代有七分、四部之法，都是圖書資訊的分類法。
- (二)當代有「國家書目」；歷代則有「史志」，是全國出版物的總紀錄。
- (三)當代有「摘要」、「解題」之法；古代有敘錄體、傳錄體、輯錄體以及總序、小序之目錄制度，是傳統之書目解題法。
- (四)當代有目錄「參照」及子目分析之法；古典目錄學有因、益、通、互以及別裁、互著之法。

[1] 喬好勤，《中國目錄學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6），頁341。

- (五) 當代目錄有「主題法」及資料庫之建置；古類書之「標題隸事」是將古籍的內容「縷析條分」隨類相從所組成的資料彙編，與當代由「數據」所建置的資料庫亦有類似之功能。
- (六) 當代目錄有「權威控制」之理論與實作；清人章學誠《校讎通義》目錄學之中已有「辨嫌名」之理論，目的即是控制文獻中疑似之名稱。

西法東來，其實已逐漸演變構成當代目錄的體制。這是一般目錄學著作所忽略的。以目前臺灣圖書館普遍使用的《中國編目規則》以及大陸的《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為例，兩者都是以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簡稱IFLA）公布的《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為基礎，參酌《英美編目規則》（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簡稱AACR2）為其架構研訂的，但為適用中文文獻的需要，又與AACR2不盡相同。當代的許多編目規範與目錄實踐是基於當代「書目控制」（Bibliographic Control）的理論而來，而西方書目控制的理論又與我國五世紀目錄學家阮孝緒《七錄》所言記天下遺書祕記之思想，不謀而合。王錦貴認為《七錄》序中說：「凡內外兩篇，合為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這應該是書目控制思想的最早表達。^[2]

目錄學的意義與內容，各家說法不盡相同，北京大學《目錄學概論》的定義是研究目錄工作形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中提到目錄學的內容包括目錄的編纂和目錄的應用，它的研究對象是圖書目錄和目錄工作。目錄學的產生和發展一直是以目錄的研究為中心。從圖書產生目錄，從目錄工作產生目錄學。因此，有了大量的圖書文獻之後產生目錄，有了目錄就有了目錄工作，也就產生了編目工作，從長期的編目工作中累積了經驗與規律，形成了目錄學。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目錄學思想與理論，而「書目控制」則是近現代形成的目錄學理論。

大陸學者鄭建明認為「當代目錄學是目錄學這門傳統的學科經歷數千年發展之後，體現其時代特徵，應用價值而形成的新的學科領域，是對傳統目錄學的繼承與發展。傳統目錄學在中國文化史、文獻史上留下了輝煌，而在今天，已難於適應人們的治學需求和信息需求，研究內容和體系需要超越時代產生新的飛躍。」^[3]

[2] 彭斐章主編，〈目錄學教程〉，《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頁183。

[3] 鄭建明，《當代目錄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7），頁4。

從歷史的發展而言，有關目錄學的分期，鄭建明引述王重民《普通目錄學》的觀點，將目錄學史的分期採用「書史的分期」，其中將1949年以後的發展時期定義為「新目錄學的時期」亦即當代目錄學時期。北京大學《目錄學概論》的劃分，以1840至1949年為近現代，1949年以後就為當代目錄學。^[4]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當代目錄學」的發展，所謂「當代」是以1949年以來為範圍。因此，1911至1949年以及現今中國大陸目錄學的發展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二、傳統目錄學的承繼

1949年以來臺灣出版的目錄學專門著述頗多，無疑的是以中國目錄學為基礎，尤其是承繼民國以來目錄學的成果而繼續發展。臺灣光復以來的幾部目錄學著作，究其內容則著重在中國目錄學「史」的探討，較少涉及當代目錄學，尤其缺乏當代目錄學系統的著述。茲就傳統目錄學的承繼，舉其大者論述如次：

(一) 分類法的變革

臺灣文史學界的目錄學著作中，涉及當代目錄學的內容，較早的應是昌彼得著《中國目錄學講義》（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10月）一書中之第七章〈西洋分類法輸入後之目錄〉討論美國杜威分類法的影響。其後劉簡著《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2月），書中第三章介紹近代圖書分類法，認為有：增訂四庫法、革新法、新舊併用法、採仿杜威法等；並依據許晚成1935年之調查整理，以明近代圖書分類法採用情形。第四章專門探討四部書改編方法，皆為探討適應近現代圖書分類需求的新方法。此書整理出「採仿杜威法派各家分類類目比較表」、「全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調查統計表」、「四部類目改編總表」頗便查考。其後，李日剛編著《中國目錄學》（明文書局，1983年8月），其中第十三章「十進雜糅於現代」，專章介紹西洋近代編號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之接受與修改，認為杜威法有仿造派七家、改良派三家、折中派五家、統一派二家；第十七章討論「分類與編目」，條列分類的方法與編目規則，介紹目錄卡片及編寫排序的方法。這兩章應是有關「當代目錄學」的著述，但主要仍是依據姚名達1933年《目錄學》方法篇一書的篇章。昌彼得、潘美月著《中國目錄學》（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第八章討論「西洋分類法輸入後的目錄」，介紹杜威十進法、展

^[4] 同註3，頁86。

開分類法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又將國內師法杜威之分類法區分為：遵杜法、仿杜法及數序法三類。胡楚生著《中國目錄學》（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9月）第八章討論「十進分類法」，介紹杜威十進法之原理，並將因應十進之《中國圖書分類法》區分為增補應用法、中外統一法及改革創造法三類。

可知，文史學界的目錄學著作中所涉及的當代目錄學，主要以討論新分類法為主，這是為了因應圖書主題的急速成長，原有的四部分類法不足以概括，因此，介紹討論各種的新分類法。但這些目錄學著作中甚少討論「編目法」，這也反映了中國歷來重分類而輕編目的目錄學傳統。

（二）仿杜威法的採行

在圖書館界方面，王省吾著《圖書分類法導論》（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2年）是較早有系統探討圖書分類法的論著，討論圖書分類的原理、分類工作及規則等，除中國古籍分類法外，並詳細介紹中外重要的圖書分類法。一般而言，此一階段，圖書館界比較著重分類與編目的實務，而較少理論的探索。各圖書館往往採用大陸時期的圖書分類法與編目法，作為館藏目錄的編製準則。圖書館使用的圖書分類法有兩方面，一般的圖書分類大都承繼大陸時期的十進分類法，古籍分類仍沿用我國古典目錄的四部分類法。大陸時期編訂的十進圖書分類法頗多，係引進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的架構。1909年（宣統元年）10月至1910年11月孫毓修在《教育雜誌》連載譯著〈圖書館〉一文，介紹西方目錄工作和《杜威十進分類法》，影響深遠。其後沈祖榮、胡慶生、杜定友、查修、王雲五、劉國鈞、皮高品、桂質柏、何日章、賴永祥等都有仿《杜威十進分類法》。

上述分類法中杜定友、王雲五、劉國鈞、何日章、賴永祥等的分類法，在臺灣都曾經使用，有些目前仍在使用中。其中劉國鈞的圖書分類法應用最廣，1964年6月賴永祥先生開始予以增訂，發行《中國圖書分類法》新訂初版，迄今已發行增訂八版，港澳地區也在使用。期間，經歷四次修訂，以增訂八版修訂幅度最大。推想其原因，可能是因自1989年增訂七版以來，其間總共有12年之久未有修訂。12年的時間，應不算短暫的光景，其間社經政治的變動飛快，學術文化的進展也日新月異，新學科、新事物、新問題又不斷湧現，凡此種種，或直接或間接促使《中國圖書分類法》非修訂不可。^[5]增訂七版是12年前出版，隨著時代的潮

^[5] 陳友民，〈《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特色試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90：12（2001），頁15。

流，海峽兩岸的交流頻繁，大陸書籍、臺灣本土化的研究書籍及電腦書籍的不斷增加也讓類目需求迅速增加。增訂八版於2001年9月出版，賴永祥也將增訂八版以後之修訂維護的工作授權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進行。

早在1979年，國立中央圖書館也曾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試用本，2001年教育部又編訂《現代圖書分類法》，都仍是十進法的架構。這兩種分類表的編訂，目標都是試圖新訂類目，以反映新學科與事物的發展，作為圖書館分類標引及一般目錄分類之用，實際上也將我國傳統的四部法予以採納融入。雖然，臺灣圖書館目前使用較多的分類法是賴永祥增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然而，也有幾種類表並行使用，進行增修或嘗試編訂新表。如何日章《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及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訂《佛教圖書分類法》等。

2007年12月，國圖出版《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包括類表及索引兩編。《中文圖書分類法》係以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藍本，參考《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以及國內編訂之《現代圖書分類法》、大陸《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等分類規範，並斟酌分類實務修訂而成，自2001年起修訂至2007年完成。新版之《中文圖書分類法》分訂為上下兩冊，上冊為「類表編」，內容包括：序、編例、使用說明、類目表、總類複分表、專類複分表、參考圖表（6種）及附錄（5種）等。下冊為「索引編」。全書收錄類目凡二萬四千餘條，比原版增加約三千條；索引凡四萬餘條，其中有中文索引三萬餘條，英文索引一萬餘條。新版分類法之內容，頗能反映當代學術文化進展及臺灣社經變遷；其編輯體制，例如增設踏步口以便翻檢，也頗能反應重視實用性的特色。^[6]尤其有關臺灣類目是修訂的重點，將臺灣史地、傳記文學及臺語四類予以詳編，其類號亦自中國類下析出，編列於亞洲相關類下，俾突顯臺灣的主體性，並提升臺灣在類表中的地位。

《中文圖書分類法》是承繼賴永祥的《中國圖書分類法》，而《中國圖書分類法》則是依據劉國鈞的分類法而來。追本溯源則是源自杜威法的十進分類法架構。《中文圖書分類法》是賴永祥授權國圖進行修訂的最新成果，預料將成為臺

^[6] 1. 陳友民，〈《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上網日期：2008.1.31。網址：<http://catweb.ncl.edu.tw/sect-1.htm>。

2. 陳友民，《中文圖書分類法》（臺北：國家圖書館，2007.12），編例。

灣圖書館主要的圖書分類法。

(三) 目錄學理論的探究與專科目錄的編纂

近年來，也有學者試圖跳脫中國目錄學史的範疇，而著重探討目錄學的理论。周彥文著《中國目錄學理論》(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就以歷代書目如何表現學術觀念為主要思考方向，並企圖由此架構出中國歷代書目和學術結合的方法和理論。本書雖以歷代的書目為探討的主體，但也企圖架構出合於現代的目錄學理論。臺灣的目錄學著作仍以闡述中國目錄學史為多，而圖書館界則往往著重實務，較缺乏理論探索。易言之，目錄學的理论與實務有些脫節。因此，本書以探討目錄學理論為目的，具有特色。另外，胡楚生及劉兆祐分別撰有《中國目錄學》也頗有理論之探討。前者討論中國目錄的體制、功用，並有專章討論古代的目錄學原理、流別及近現代的十進法。後者除討論中國目錄的體制、功用外，有專章討論目錄之分類、與目錄學有關之基礎知識、目錄學之實踐與目錄之運用等。從這些專著中，可窺古代的書目編纂不僅數量繁多，累積的目錄理論與方法對於當代仍有諸多致用與啟示之處，值得持續探索與發揚。

此外，當代的學術界編輯專科目錄的風氣越來越盛，可說是當代目錄學的特色之一，但如何編輯專科目錄的理论與方法的著述則不多。林慶彰主編，何叔蘋編撰《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9月)，收錄林慶彰、胡楚生、陳進益等有關專科目錄編輯方法的論述，有編輯方法理論與實務之探討，具有實用價值。專科目錄的探討應有助於當代專科書目的編纂，而利於學科文獻之利用。

(四) 編目法之承繼與取法西洋

在編目法方面，中國古代目錄學家如鄭樵、祁承燁，章學誠之著作裡已論及目錄的編製理論與方法。民國以來，除了有一些編目法的專著之外，漸改以條列方式彙集編目著錄之法則，形成規則，以便利圖書館進行編目。

政府遷臺之初，臺灣各圖書館目錄的著錄依循大陸時期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民國24年草創)，內容包括：普通圖書、善本圖書、期刊、地圖、拓片之著錄規則。直到1981以後，受到ISBD及AACR2兩項國際編目規則的影響，以《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為基礎編訂成現今的《中國編目規則》，用以因應各種媒體的編目著錄以及目錄自動化的需求。新的《中國編目規則》保留了我國固有編目的特色，諸如：以書名為主要款目(即「以人類書」)，

包括古籍、拓片專章等。近十幾年來，此項規則已廣為臺灣圖書館界使用。1995年6月及2000年續有修訂版及使用手冊行世，第三版使用手冊的編訂也於2008年初完成，即將付梓。本規則之出版對於大陸近年來出版之《中國文獻編目規則》應相互有其影響。而不可諱言，兩岸的編目規則的架構、觀點與方法已是取法西洋，而與世界同步。

三、書目控制的理論與實踐

臺灣「當代目錄學」的發展特色，可說是深受國際「書目控制」理論的影響。這種理論的倡導與實踐由IFLA所積極推動，影響層面遍及全球。

(一) 書目控制的源起與意義

「書目控制」(Bibliographic Control)一詞最早是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伊根(M. E. Egan)和謝拉(J. H. Shera)於1949年所提出。^[7]196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編目專家會議」(IMCE)目的即在探討國際合作編目的可能性，呈現國際書目控制的觀念及實施步驟。1973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IFLA大會上即以「國際書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簡稱UBC)為大會主題，大會主席利貝爾斯(Herman Liebaers)提出UBC為IFLA的主要目標，並列為核心工作。1974年IFLA UBC Office正式運作，1986年IFLA將UBC與IMP(International MARC Programme, 國際機讀目錄計畫)合併為UBCIM(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國際書目控制暨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其主要的工作是制定與維護ISBDs及UNIMARC。至今，IFLA仍有「書目控制組」(Divis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主要的活動內容是經由書目的建立與交換進行館藏與資訊組織，增進有關編目、分類、目錄及知識管理之專業團體的結合。其下又分：書目、編目、分類與索引及知識管理四部分。編目部分則與ISBD、FRBR團體密切聯繫。

依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謂書目控制「意指對於每本圖書、每件文獻、甚至每種書寫的思想、有聲資料的內容、存佚、所在，均加以妥善登錄與組織。其目的係將人類各種溝通紀錄有系統地排列，以便於管理、傳遞與利

^[7] 1. 程麟雅，〈書目控制研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4：3（1998.3），頁59。

2. 同註2，頁185-186。

用。它是建立、儲存、操作並檢索資料的過程，蘊含著兩個層面，一為描述層 (Descriptive Domain)，一為探索層 (Exploitative Domain)。前者以保存為導向，將收藏的資料經由編目、製作索引、摘要等方式加以描述，以便能適切地指引；後者為使用者導向，在此領域中，資訊需求者不但查尋所需資料，而且有效的加以利用」。要達到書目控制的目的，應具備下列基本要件：(1) 各類資料目錄。包括圖書、期刊、輿圖、政府出版品、音樂作品、小冊子、論文、視聽資料及電子出版品等類型；(2) 期刊論文索引；(3) 出版社、書商、學會、圖書館及其他相關組織名錄；(4) 標準化。包括書目著錄、編目規則、主題分析及機讀編目格式等。^[8]

(二) 書目控制的探討與實踐

1972年8月，筆者曾譯介余秉權在澳洲坎培拉舉行的「第二十八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題為〈國際在中文期刊書目控制的努力：過去與現在〉，是臺灣較早注意國際上中文期刊書目控制的議題。^[9]1977年，張鼎鍾教授撰〈國際書目控制〉一文，引介國家書目控制與國際書目控制的觀念，並介紹美國以及IFLA的書目控制計畫。^[10]

1983年，林呈潢撰「我國書目控制工作及其發展史」論文中，除探討我國歷代出版事業及書目發展情形外，有專章論述民國以來的書目控制以及國際書目控制的發展及現況，並檢討我國書目控制工作，提出相關建議，指出「建立完善送繳制度，是當前建立我國書目控制系統的一大要務，而送繳制度的建立有賴有關出版法令的修改。同時應配合國際標準建立我國的各種國家標準，如標準圖書編號、標準叢刊編號、標準政府出版品編號以及各種標準書目著錄方法，並確立合作制度，建立國家目錄中心以建立全國資訊網加強書目控制工作。」^[11]

陳昭珍撰〈IFLA國際書目控制工作之探討〉一文，認為IFLA的國際書目控制

[8] 陳敏珍，〈書目控制〉，《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冊（臺北：漢美，1995），頁1212-1213。

[9] 余秉權撰，鄭恒雄譯，〈國際在中文期刊書目控制的努力：過去與現在〉，《教育資料科學月刊》，4：2（1972.8），頁9-11。

[10] 張鼎鍾，〈國際書目控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29（1977.11），頁131-138。

[11] 1. 林呈潢，「我國書目控制工作及其發展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7），頁16-17。

2. 林呈潢，〈我國的書目控制工作〉，《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2：1（1984.9），頁66。

計畫有幾項成就：制定國際標準書目著錄格式、推動國家書目之編輯、發展國際機讀編目交換格式、款目形式的標準化、國際出版品利用計畫 (UAP)、國際資料流通與通訊計畫 (UDT)、出版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 (ICBC)。^[12]

1993年，張鼎鍾撰〈國家圖書館與書目控制〉一文，提及國圖自創館以來歷任館長均以書目控制為首要工作，並能掌握書目控制的要點，打好穩固的基礎。唯在標準的訂定方面尚待發展和努力，並希望國圖早日完成標題和索引典的訂定。^[13]盧秀菊於1995及1996年間研究〈國家書目中心之書目控制〉，探討書目控制的理論與實務、書目中心的意義與內涵、國家書目中心書目控制的意義與內涵、各國國家書目中心書目控制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等。對於規劃國家書目中心提出以下六點建議：收集各國發展經驗，敦聘專家擔任顧問，規劃任務、目的、目標，擬定執行計畫，研究國家書目資料庫的結構及內容，探討與其他地區或國家進行書目控制之合作事宜；以作為意欲規劃全國書目控制及國家書目中心者的參考，俾使國家圖書館與資訊中心透過書目控制，以達資源共享的目標及有效服務讀者的使命。^[14]

1998年，程麟雅撰〈書目控制研析〉一文，討論書目控制的概念、由來及發展歷程，認為圖書館自動化之後的書目控制與人工作業時代不同，而網路普及後的虛擬目錄時代，也改變了書目控制的型態及資訊檢索方式。^[15]

在書目控制理念的影響之下，臺灣當代目錄體制的實踐，有了積極蓬勃的發展。尤其，王振鵠的書目學理念即著眼於當代的「書目控制」理論，而又能與中國目錄學相結合，他主持中央圖書館期間並具體予以實踐。^[16]因此，在「書目控制」理念的引領之下，臺灣的書目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1. 國家書目及其資料庫之建置：由國圖建立。

^[12] 陳昭珍，〈IFLA國際書目控制工作之探討〉，《圖書館學刊》(臺大)，7 (1991.11)，頁257-262。

^[13] 張鼎鍾，〈國家圖書館與書目控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6：1 (1993.4)，頁34-37。

^[14] 盧秀菊，〈國家書目中心之書目控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7 (1996.12)，頁9-33。

^[15] 程麟雅，〈書目控制研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4：3 (1998.3)，頁58。

^[16] 鄭恒雄，〈王振鵠教授的書目學理念與實踐〉，《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2 (2005.10)，頁31。

2. 出版品預行編目制度及系統之建立：國圖設立書號中心負責推動與建置。
3.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路系統之建立：國圖設立書目資訊中心推動合作編目，建立聯合目錄，推動書目資源共享。
4.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之建立：國圖設立期刊文獻中心負責推動期刊資源之建置與提供服務。
5. 編訂各種書目資訊規範與標準：國圖與圖書館學會團體共同合作，推動各項規範與標準之訂定。

四、書目資訊規範化的發展

書目資訊的規範化是從「書目控制」理論發展出來的，也是書目控制的重要手段，舉凡書目的著錄、文獻的分類、機讀格式、字集與字碼等等都要求標準化。不僅如此，從文獻的產生到文獻的管理與流通都講求標準化與規範化。這應是當代目錄學的重要理論。

(一) 書目規範與標準的研訂

臺灣約自1980年起，爲了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著手進行研訂一系列與目錄息息相關的規範，包括：機讀格式、編目規則、標題表與字集字碼等。國圖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並設立三個工作小組，分別研訂《中文機讀編目格式》、《中國編目規則》及《中文圖書標題總目》三項規範。而在1979年，行政院也召開會議籌劃電腦用中文字形的整理與制訂工作，在1980及1981年間完成兩套中文資訊交換碼，即「通用漢字標準交換碼」及「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這些規範逐漸成爲國內圖書館進行自動化作業，尤其是書目建檔的主要依據，而在往後的十數年來，也陸續進行修訂與維護，爲國內圖書館館際技術服務的合作創造條件。臺灣各個圖書館的自動化與書目網路系統，乃至民間業界開發的各項書目系統，其所遵循的規範與標準，近年來有漸趨一致的發展。主要就是以這些規範標準爲基礎逐步發展而來。

1997年間，國圖建置「編目園地」網站，彙集了國圖及圖書資訊界所訂定之各項編目規範，提供參考使用。因爲國圖負有研訂及推廣各項圖書資訊技術服務規範與標準之責任，建置「編目園地」網羅中西文編目規範與標準，可藉以呈現各項規範的內容，提供線上瀏覽與檢索利用。目前園地的此項內容，中文方面包括：分類法、標題表、編目規則、機讀格式、Metadata、權威記錄、資料庫等，並

建立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西文方面大致也是上述類別。

隨著各項規範的研訂，有關的理論與實務探討之論述，十分豐富，可說是近年來臺灣「當代目錄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各項規範的研究論述，往往出自參與研訂的學者專家所撰述發表。茲因各項規範及參與研訂者頗多，僅酌予列舉並註記編訂年代，如下：

1.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及《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李德竹、張鼎鍾、黃鴻珠、胡歐蘭、黃克東、吳明德、吳瑠璃、鄭恒雄、江綉瑛等。機讀編目格式於1981出版稱爲《中文圖書機讀編目格式》，1982年改爲今名；至1997年編訂至第四版，2001年修訂版改於國圖網站公布。權威記錄格式則於1986年編訂，原稱《中國機讀編目權威記錄格式》，1994年改今名。
2. 《中國編目規則》：藍乾章、盧荷生、陳和琴、吳瑠璃、鄭恒雄、王國聰、吳明德等。本規則於1980年著手編訂，1983年完成第一版之編訂，已修訂至第三版，使用手冊亦於2008年初完稿。
3. 《中文圖書標題表》：1984年國圖出版《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初稿》，由標題小組負責編輯，成員包括：劉崇仁、藍乾章、林愛芳、黃淵泉等。1993年增訂改稱《中文圖書標題表》，1995年出版修訂版。
4. 《中文主題詞表》：莊芳榮、鄭恒雄、盧秀菊、吳瑠璃、江綉瑛、劉春銀、陳友民、嚴鼎忠等。本表於2005年編印發行。
5. 《中國圖書分類法》：賴永祥、黃淵泉、莊芳榮、陳友民等。本法於1964年首次編訂，至2001年發行增訂第八版。
6. 《中國圖書分類法》(試用本)：王振鵠、藍乾章、林愛芳、黃淵泉等。國圖於1979年編訂發行。
7.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包括類表編及索引編，由國圖組織修訂委員會編訂。

至於各項規範之研訂情況，可見於各規範書前之序文或說明。有關規範的探討著述頗多，如：盧秀菊的論著頗具前瞻性，撰有〈中國編目規則之原則與未來發展之探討〉(《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4期，2000年6月)，文中指出1997年於加拿大多倫多市舉行的英美編目原則與未來發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incipl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ACR, Toronto, 1997，簡稱ICP或Toronto Conference)探討之編目原則與相關議題可爲我國未來編目規則發展之參考。盧秀

菊另有〈圖書館目錄之書目關係〉一文（《國家圖書館館刊》2000年第2期，2000年12月），亦述及ICP會議關切AACR未來之發展，值得國人關注。李德竹、盧秀菊共同主持「中文主題標目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997年7月）；盧秀菊又撰有〈中文主題標目與標題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9期，1997年12月）。文中對於《中文圖書標題表》之未來發展提出六項建議如下：增加該標題表標題詞收錄之數量；進行標題詞之詞彙控制；利用《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之定長欄位以替代部分複分標題詞之功能；定期公告增改與刪除之標題詞並編製標引手冊；建立全國性標題機讀權威檔；利用該標題表以整理網路資源。這些建議對於往後規範的訂定頗具參考價值。

分類法方面，國圖編目組陳友民對於類目增改經驗豐富，撰有〈《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特色試探〉一文，認為八版具有以下八大特色：兼顧穩定性、講求規範性、編制之改進、類目之增補、插表之調增、表譜之增列、附錄之充實、索引之增編等。近年來類表的修訂成果是新訂的《中文圖書分類法》，這是近六年來國圖網羅國內圖書分編之學者專家，共同研訂的成果。

此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也制訂了一系列的圖書資訊標準，李德竹撰〈我國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圖書與資訊學刊》28期，1999年2月）整理分析1969至1998年間公布的國家標準共56項，有關書目之標準約有十餘種。標準檢驗局也建立「國家標準檢索系統」，可供檢索及下載印製。

（二）機讀編目之興盛

「機讀編目」（Machine Readable Cataloging，簡稱MARC）的興盛，無疑的是當代目錄最重要與影響深遠的發展。機讀編目源自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研發，是以編碼方式和特定的結構記錄於電腦儲存媒體上，可以自動處理及產生目錄資訊。「1964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研究機讀目錄系統，1965年提出MARC1，1967年又提出MARC2，1969年3月開始正式向各圖書館發行MARC2磁帶。MARC的影響遍及全世界，帶動了各國機讀目錄的發展。」^[17]

臺灣約在1980年開始推動研訂機讀目錄格式，於1981年正式編訂出版《中文圖書機讀編目格式》，主要以UNIMARC-1980為藍本，參考MARC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1980及其他各國之機讀格式。磁帶上之書目著錄則採用ISO 2709

^[17] 周文駿主編，《圖書館學情報學辭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12），頁191。

格式，中外文書目著錄格式則分別依據同時進行研訂之《中國編目規則》及AACR2為標準。1982年修訂本改稱《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迄今發行至四版及2001年修訂版。

另外，為了確保讀者檢索目錄使用「標目」的一致性，理想的機讀編目對於讀者檢索的「標目」須予以適當的控制，這些「標目」包括：人名、地名、主題、題名、機關團體名稱等，這類標目建立的依據稱為「機讀權威記錄格式」或稱「機讀規範格式」。1986年編訂《中國機讀編目權威記錄格式初稿》，主要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機讀編目權威記錄格式」及1984年IFLA刊行之「國際機讀編目權威記錄格式」為藍本，1994年改訂為《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

目前國內圖書館大都採用以上兩項格式，作為書目建檔標準，並要求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業界遵循。近十幾年來，臺灣圖書館的線上機讀目錄已取代之有年的卡片目錄。尤其通過網際網路，大幅提升了書目檢索的功能，這應是機讀編目的重要貢獻。

五、網路環境下的書目控制

當今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資訊科技的影響無所不在，各行各業無不受其影響。電腦與網路的應用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環，對於學術與知識的追求也是一項利器。目錄的工作自然也從傳統的手工方式轉化為運用電腦技術來製作與檢索利用，尤其網路興盛之後，目錄學所受衝擊極大，網路環境下的書目控制成為主要課題，茲舉近年來的三項發展說明之：

(一) 元資料 (Metadata) 的興起

由於電腦科技與網路的發達，網路資源的無序化與混沌化等現象，已使得網路電子資源的應用與搜尋皆發生了不同層次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圖書館試圖以書目控制的方式來達成，而電腦界則趨向採取網路資源探索的方式來完成，但是兩者皆有優缺點，為了因應解決這類問題，Metadata遂應運而生。^[18]由於現今網路及電子資源之蓬勃發展，現有資訊組織模式較難適用於各種電子資源整理之需求，因此Metadata成為電子資源組織的重要研究課題。為了顧及各類資料之特色與

^[18] 陳亞寧，〈從書目控制到網路資源探索談Metadata——由Dublin Core談起（上）〉，《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16（2000.3.27）。

屬性，各學科領域往往就其特色與使用需求，設計各自的Metadata格式。^[19]

Metadata在臺灣譯稱「詮釋資料」或「元資料」、「超資料」，又稱「後設資料」。其類型頗多，除圖書館的MARC之外，博物館社群有CDWA，CIDOC；檔案館社群有EAD；政府社群有GILS；視覺資源社群有VRA Core Categories；文字型資料有TEI等等。討論Metadata的文章頗多，依據國圖「期刊文獻資訊網」記載近五年（至2008年1月）有文獻146篇。圖書館學界似以探討Dublin Core、EAD及TEI為多。

有關Metadata資料的探討，吳政叡的著述較早較多，有：《都柏林核心集與元資料系統》（漢美，1998年）、《機讀編目格式在都柏林核心集的應用探討》（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12月）、《UNIMARC和機讀權威記錄格式的應用探討》（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10月）、《都柏林核心集與圖書著錄》（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12月）等專書。著者的看法頗有代表性，認為「元資料是因應現代資料處理上的二大挑戰而興起的：一是電子檔案成為資料的主流，另一是網路上大量文件的管理和檢索需求。」^[20]著者探討DC的一系列著作，認為MARC與DC可順利轉換，因此可接收以往MARC所累積的資產。^[21]

為了使各類Metadata得以互通（Interoperability），2000年國圖設立Metadata研究小組，旨在探討國內外Metadata發展現況、發展各主題領域或資料類型之Metadata、研究MARC與Metadata轉換之語法、語意等相關標準等。國圖曾收集國內所設計的Metadata格式，編印為《中文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彙編》。2003年又訂有「詮釋資料格式規範」，並建議採用Dublin Core的15個欄位核心，作為各種詮釋資料的擴充發展基礎，以及彼此資料間的交換欄位。同時，也建議以XML作為詮釋資料之交換語法，UTF-8作為XML記錄之交換字碼。

另外，近年來臺灣積極推動博物館及圖書館數位化計畫，國科會設立數位博物館專案資訊組織與檢索之規範研究小組（ROSS），編訂了《MICI-DC、DTD、著錄範例及著錄手冊》，截至2000年底已完成的詮釋資料約有28種。2002年行政院成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簡稱

^[19] 詮釋資料格式規範研訂小組，《詮釋資料格式規範》（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1-1。

^[20] 吳政叡，《都柏林核心集與元資料系統》（臺北：漢美，1998），自序，頁6。

^[21] 吳政叡，《UNIMARC和機讀權威記錄格式的應用探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10），自序，頁2-3。

NDAP)，承繼先前「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重新規劃發展。依據《數位典藏技術彙編》2004年版，收集了技術規範內容187篇。參與的機構甚多，包括：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學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圖等機構。各項計畫所使用的Metadata都是引進國外的標準，NDAP與圖書館相關的計畫使用了五個Metadata標準，即EAD、DC、FRBR、MARC21、OAI，其中以DC及OAI居多。^[22]中央研究院並設立「後設資料工作組」，協助後設資料國際標準之策略規劃與應用，以及後設資料理論的研究發展。

在機讀格式與Metadata轉換方面，國圖已建置「機讀編目延伸標示語言文件網頁服務」。因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雖具超強資料處理與檢索特性，但目前最大的瓶頸在於跨系統間的資料傳遞與分享，使用者必須熟悉各個系統不同的操作方式，方能順利取得所需資源。臺灣圖書館界普遍採用CMARC格式著錄資料，需透過中文編目文件格式定義（CMARC DTD）的研訂，再將CMARC格式與DC格式互轉，使這些資料於各系統間皆能相容、解讀、處理、傳遞與輸出。目前CMARC DTD亦已編訂完成。

(二) FRBR與RDA的發展趨勢

網路環境之下，另一項值得重視的發展是IFLA展開「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簡稱FRBR) 研究與JSC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繼AACR2之後進行的新編目規則「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簡稱RDA) 的發展。

IFLA早在40餘年前就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編目理論及國際編目實務，1961年IFLA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性編目原則會議及196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編目專家會議都有豐碩的成果，包括「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 及「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奠定了各國及國際編目規則的基礎。隨著電腦技術和網路技術的發展，資訊資源大量增加，資訊媒體呈現多樣化趨勢，傳統的圖書館編目受到衝擊，如何有效的組織，有效的顯示書目之間的關係，以及有效的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成為編目工作最關切的問題，為了適應當前圖書館資訊組織工作的需要，IFLA遂展

^[22] 陳亞寧、沈漢聰，〈圖書館社群後設資料發展及其應用之分析：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為例〉，《21世紀數位圖書館發展趨勢》(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公司，2005)，頁60-61。

開FRBR的研究。

FRBR報告於1998年公布，針對數位環境下多元資源來研擬新的著錄模式，這個新的書目著錄模式可以將同一部作品（Work）的不同表達方式（Expression）、不同媒體（Manifestation）以及不同館藏（Item）在一個目錄體系中完全展現出來。由於FRBR不論在觀念上或是實作上都將對未來的編目作業與書目紀錄在OPAC的呈現和檢索方式造成極大的影響，甚至可以應用於電子圖書館，讓各類型資訊資源的版本連結更具彈性。

國外對於ISBD、AACR2、MARC21等標準已進行修訂研究，對於如何因應也有進展，至於我國編目規則及機讀編目格式等標準如何納入FRBR模式，使圖書館目錄更具親和力，能掌控書目紀錄呈現的國際發展趨勢將是必須努力的方向。有關FRBR的探討，陳和琴、戴怡正、徐蕙芬、張慧銖等已有論述發表，國圖於2005年7月已進行「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採用FRBR模式研究計畫」，研究的重點係仿效OCLC WorldCat所作的「FRBR規則系統」來撰寫程式，並從NBINet書目資料庫中選擇樣本，進行書目中題名以及著者兩個欄位的測試，以此比對進行分析，來瞭解FRBR模式是否具有書目聚集的效果，作為NBINet進行FRBR模式的決策參考。

至於RDA，將作為數位環境下資源著錄與檢索的新標準，主要用於圖書館，也正在和其他領域，如檔案、博物館、出版業等協商，以期能夠實現RDA與在這些領域使用的元資料標準的有效協調和統一。RDA將為各種內容和媒體資源提供著錄與檢索的一套完整的使用指南和方法，自然也是臺灣圖書館編目界所關注的議題。

（三）文獻計量學的研究

很難想像，目錄學發展到現代能與數學連結，出現了計量化與精確化的發展，為當代目錄學開展了新的領域。何光國撰《文獻計量學導論》（三民書局，1994年）談到「圖書館學和資訊學，就像其他社會和人文科學一樣，都不能算是精密的科學。有關圖書資訊本質和利用的討論，都常常出自『以己之見』，非常主觀。所幸，半個世紀以來，由於數學、統計、作業分析、系統分析等的研究發展，再加上經濟學原理及科學管理的理念，逐漸滲入圖書館學及資訊學，才使這些意見式的主見，日漸淡化。客觀的說理方式，代之而興。所謂『客觀說理』是指討論問題，除去文字敘述和引經據典以外，還佐以適當的數學公式、邏輯推理、和各種統計數字及圖表，並利用計量方法來分析問題發生的原因，從而研判

可能導致的近期和遠期的影響及成果。最後，再根據這種預測和判斷，擬訂各種相應的對策。」「圖書館學的研究重點，在探討成型資訊的蒐集、組織、儲存、管理、傳遞和利用。而資訊學的研究，則集中在資訊的形成和結構。利用數學和統計方法作學術性的研究，已有很久的歷史。然而，它們的運用到圖書館和資訊學，尤其是前者，僅不過半個世紀。」^[23] 本書討論文獻計量學的法則、文獻成長、文獻分布、引用文獻分析、文獻老化等問題，各項議題成爲當代目錄學的課題，其中「引用文獻分析」的論述不少。

其實，英美目錄學界很早就開始了目錄學的定量研究。「1923年赫爾姆提出了『統計書目學』一詞。隨著書目計量研究的進展，1969年『計量書目學』被『書目計量學』替代，後發展爲今天的『文獻計量學』，成爲英美目錄學的一大成果。今天文獻計量學已是圖書館學、情報學、目錄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網路文獻的驟增導致對網路文獻的研究、評估等成爲新的趨勢。文獻計量學也不甘落後，現在已出現了『網路目錄學』和『網路計量學』等名詞，意在研究網路文獻的分布與傳播規律。所以當今的目錄學研究者，應敢於接受和採用新的資訊技術，以建立一套以書目工作自動化、網路化爲基礎的新的目錄學定量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如網路文獻的規範控制、網路檢索策略、網路文獻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整個目錄學學科（方法、內容）的數學化還在發展之中。」^[24]

有關文獻計量學的討論，依據國圖「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之記載，近五年約有40篇，以蔡明月之論述居多，著有《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國立編譯館，2003年），內容包括：資訊計量學的綜合論述、文獻成長與老化、書目計量學三大定律及引用文獻分析四大部分。除了理論之外也包括相關的實證研究。^[25] 所謂「資訊計量學」之名稱之外，尚有「圖書館計量學」、「書目計量學」、「科學計量學」、「資訊計量學」、「網路計量學」等名稱，這些名詞經常被交替使用，其內涵互有重疊。^[26] 另陳光華著有《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文華圖書館管

^[23]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自序，頁1-2。

^[24] 1. 劉青，〈數位時代的目錄學研究及其發展趨勢〉，《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2（2007），頁46。

2. 赫爾姆（F. W. Hulme，或譯作「休姆」）。

^[25] 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自序，頁5。

^[26] 蔡明月，〈論資訊計量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0：2（2004.10），頁85。

理資訊，2006年2月），並建置「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一書可謂臺灣地區第一本針對引用文獻索引（Citation Index）資料庫建置之實作專著。^[27]

大陸目錄學者喬好勤認為目錄工作實踐活動已進入網路資訊目錄控制的新階段（當然書本式目錄工作還會長期存在，切莫誤解！），目錄學研究的重點應該儘快轉移到網路資訊目錄工作及其檢索工具上來。目錄學研究者應該積極參與網路資訊資源建設！開發和利用這一龐大的世紀工程，找準自己的活動領域，真正把目錄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時代——網路目錄學階段。^[28]

六、結 論

從古至今，「目錄」都有其一定的社會與學術之價值，中國古典目錄已積累豐富的成績，時至今日臺灣目錄與目錄學的發展如何？從前述探討可知，一為承繼中國目錄學的傳統，此以分類法及編目法為主；一為深受西方「書目控制」理論的影響，此以編目規範與機讀目錄的發展為最。尤其，今日資訊科技及網路通訊的發達，目錄與目錄學又有新的面貌。

（一）當代目錄學研究與實踐的成果

在中國目錄學的承繼以及「書目控制」理念的引領之下，臺灣當代目錄學的研究與實踐已有豐碩的成果，歸納如下：

1. 分類法的持續研訂與運用：從大陸時期的十進法轉變為最新修訂完成的《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是臺灣各圖書館進行圖書分類與館藏組織的主要依據。
2. 各種書目資訊規範與標準的研訂：主要由國圖及圖書館學會主導研訂，除分類法之外，包括：編目法、主題法、機讀格式、權威記錄格式、Metadata等等，作為書目編纂及資料庫建置的依據。國圖並實際建立「編目園地」網站網羅國內外主要的編目規範，提供參考。
3. 國外書目控制理論的引進、探討於實踐：包括：IFLA推動的國際書目控制、

^[27] 蔡明月，〈書評：陳光華著《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國家圖書館館刊》，95：2（2006.12），頁177。

^[28] 喬好勤、李錦蘭，〈當代目錄學的理论與實踐〉，《圖書與情報》，3（2001），頁5。

國家書目控制 (NBC)、MARC、ISBDs、FRBR等，JSC制訂的AACR、RDA規則等等及其他國際組織制訂的書目規範。經由專文介紹、學術研討會及講習會等等成爲書目活動的主要依據。臺灣近幾十年來的書目實踐成果十分豐富，舉其要者如CIP制度及系統之建立、NBINet書目網路及聯合目錄系統之建立、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之建立等等。尤其，國內各圖書館建立書目資料庫與OPAC系統，從卡片目錄轉型爲電腦檢索的線上目錄，大幅提升文獻的檢索功能。

(二) 圖書館人扮演目錄工作的積極角色

當代目錄的體制伴隨著圖書館的營運與發展產生變化，尤其引進西方目錄學的方法所建立的各種目錄體制，包括：各項分類編目方法、規範標準、書目中心、CIP制度、MARC、Metadata等等，充分運用於當代的各項書目活動中，呈現新的風貌。尤其，當代的目錄學與資訊科技以及西方引進的圖書館學關係密切，因此，圖書館人以及相關資訊工作者與傳統的目錄學者比較，更能發揮所長，成爲當代目錄工作的主角。圖書館的目錄工作是日常技術服務工作的主體；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工作也往往經由目錄提供服務。圖書館人編製館藏目錄及主題書目乃至建立各種書目資料庫，究其實際都是當代的目錄工作。因此，可以說圖書館人是當代目錄工作的主角。

(三) 當代目錄與目錄學新發展的探討

誠如前述，當代臺灣目錄事業的發展已有新的面貌，尤其引進西方目錄學的方法所建立的各種目錄體制，不論從整體和微觀的角度，都可以進行仔細的探討，分析其利弊得失。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源自西方目錄學方法之際，也要思考我國文獻之特色而能承繼發揚古典目錄的精華，這似乎可以先從當代目錄學的各项新發展與新方法入手，進行探索。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目錄學界對古典目錄曾經熱烈的討論，進行總結之外，同時並探索當代目錄學的任務與方向。對於當代目錄學的探討，有：鄭建民《當代目錄學》(1994年7月)、劉國華編著《書目控制與書目學》(1997年12月)、武漢大學彭斐章教授主編的《目錄學教程》(2004年7月)，內容亦包括當代的目錄學。相形之下，我們在臺灣的目錄學界，長期以來有關目錄學的著作，大多仍偏重目錄學史的敘述，對於當代目錄學的探討反而較少論及。

臺灣近幾十年來的目錄事業雖然頗有可觀的成績，諸如編纂各類書目、書目自動化與線上目錄的發展，對於使用者都十分方便。然而，書目的質與量都有改

進與發展的空間。臺灣幅員不大，但是出版品的掌握與目錄服務方面，始終不夠新穎與完整。未來在版權控制、目錄控制及文獻內容揭示等工作，都有待努力。目前，大陸及歐美等地都有華文書目資料庫的建置，期望能經由交流與合作，進而在國內建置全球的華文書目資料庫，提供各項目錄服務。

書目規範的研訂與維護是書目控制的主要內涵，經由規範的訂定達到標準化與一致化的目標，以促進國內外書目資訊與文獻的交流。目前，國內與先進國家一樣，圖書資訊的規範與標準大抵遵循國際標準。雖然有共同的標準可資遵循，但是如何切合國內的需求，則須不斷的研究探討。尤其，網路環境下的書目控制已是當代目錄學發展的新課題，如何運用新科技與目錄工作結合，也是新一代目錄工作者的職責。

(本文依據著者於2008年5月16日在輔仁大學主辦之「由圖書館學到圖書資訊學——跨越兩個世紀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修訂。)

參考文獻

- 吳政叡。《都柏林核心集與圖書著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12)。
- 周彥文。《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9)。
- 胡楚生。《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9)。
- 張鼎鍾。〈國家圖書館與書目控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6：1 (1993.4)，頁34-37。
- 陳友民。〈《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特色試探〉，《全國新書資訊月刊》，90：12 (2001)，頁15。
- 陳昭珍。〈IFLA國際書目控制工作之探討〉，《圖書館學刊》(臺大)，7 (1991.11)，頁257-262。
- 彭斐章主編。〈目錄學教程〉，《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3)。
- 劉青。〈數位時代的目錄學研究及其發展趨勢〉，《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2 (2007)，頁46。
- 劉國華編著。《書目控制與書目學》(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7.12)。
- 鄭建明。《當代目錄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7)。
- 盧秀菊。〈國家書目中心之書目控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7 (1996.12)，頁9-33。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in Taiwan : From Tradition to Present

Heng-hsiung Cheng

Abstract

Chinese Bibliography has had a long history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each dynasty, Chinese Bibliography also has its special feature.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in Taiwan has its heritage from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impact from western bibliography. A lot of cataloging methods especially came from international and western world using for deal with Chinese materials. We could say that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western bibliography have migrated and become parts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For example, classification, cataloging, subject cataloging and database establishing have developed promptly in Taiwan during several decades, which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This article firstly discusses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including the changes and additions of classification scheme, the

Keywords (關鍵詞) :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 Bibliographic Control

當代目錄學 ; 書目控制

Heng-hsiung Che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E-mail: chenghh@blue.lins.fju.edu.tw

choice of emulation tables of DDC,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ory and compiling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ataloging rules and following the examples from western.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including the origin and definit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discussion on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t's practice. The article third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 and rules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compiling and editing of the standards and rules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C etc.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on the bibliographic control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origin of metadata, the development of FRBR and RDA, the study of bibliometrics. The article finally concludes 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in Taiwan, the role of librarian i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and the future study of catalog and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in Taiwan.

